

周易图象学思潮

李 申

原始人的图画发展为文字，原因之一，是图画属形象思维，只有文字才能表达众人共识的抽象意义。《周易》卦象也是表达抽象意义的符号。汉代图纬盛行，但没有可靠的资料可以证明，汉代人在卦象以外，还创造过具有抽象意义的易学图象，至少是没有大量创造过这类图象。从北宋开始，学者们创造了具有抽象意义的易学图象，此后虽不断遭到反对，但此风仍然越演越烈，并从易学扩大到其他学术领域，形成图象学思潮。

一、易学基础之转变

图象学属象数派，但汉代象数派重象而宋代象数派重数，易学基础的这种转变与整个社会思潮的转变有关。

《周易·系辞传》说：“天垂象，见吉凶，圣人象之”；又说：“是故夫象，圣人有以见天地之赜而拟诸其形容，象其物宜，是故谓之象”。这就是说，卦象，乃是天地之间事物形象的象征。至少以春秋时代开始，人们已大量利用卦象所象征的事物、现象及其相互关系来解释占筮的结果。

卦象所象征的事物，最著名的是八经卦象征天、地、风、雷、水、火、山、泽。《说卦传》中，象征的事物和现象达140余种。适应这种社会思潮，人们认为，八卦的产生，乃是圣人“仰观俯察”的结果：

古者包牺氏之王天下也，仰则观象于天，俯则观法于地，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，近取诸身，远取诸物，于是始作八卦，及通神明之德，以类万物之情（《系辞传·下》）。

这是关于八卦起源最早、最权威的说法。

汉代人讲天人感应。天人感应的基本内容，乃是天通过各种自然现象（包括社会现象）表示它对人事的态度。因此，观察这些自然现象，并且作出解说，是汉代思想家的主要事业。

在一般的学术活动中重视研究自然现象和社会现象，表现于易学，就是重视对卦象的研究。这是汉代象数派兴盛的基本原因。著名的象数学家，如西汉的孟喜、焦贛、京房；如东汉的荀爽、郑玄、虞翻等等。

汉代象数派学术活动的主要内容，是研究卦象的结构及其相互关系以确定占筮原则，然后根据卦象象征事物的相互关系对占筮结果进行解释。他们继承以前的成果，加上他们自己的研究，提出了之卦、互体、飞伏、升降等等变卦原则。这样，当筮得某一卦时，如该卦与所占内容不合或占筮者认为不合，即可依据某种变卦方法变到另一卦，再行占筮，直到占筮者能得到完满解释为止。对卦象研究的发展，也旁及某些模式系统：五行、音律、天干、地支等等。卦象和它们配合起来进行占卜，出现了纳甲、爻辰等前所未有的占卜方法。这种倾向进一步发展，就是后来的奇门、遁甲、六壬、太乙等占卜术。

关于八卦的起源，汉代人仍然保持观物取象的观点。

据李鼎祚《周易集解》，“仰观”，荀爽说是“震巽为雷风，离坎为日月也”；“俯察”，《九家易》说：“艮兑为山泽，地有水火五行八卦也”。虞翻据“天垂象，示吉凶”，认为“天已有八卦之象”、“鸟兽之文”，荀爽说是“乾为马、坤为牛”之类。陆绩说是朱鸟、白虎、青龙、玄武、二十八宿等等。

“地之宜”，《九家易》说是“四方四维八卦之位，山泽高卑五

土之宜”。清代惠栋《周易述》所述，与上述内容大同小异。

魏晋时代，玄学代替了汉代经学，以王弼为代表的义理派易学也代替了汉代的象数派易学。义理派易学不深究卦象，自然也不深究八卦的起源。他们认为最重要的是卦象中所包含的“意”，得到了这个意，卦象就可弃之不顾。实际上，他们把卦象当成了某种道理的象征。

唐代李鼎祚作《周易集解》，汇集了已残缺不堪、行将灭绝的汉代易学著述。一行在《大衍历议》中重提汉代卦气说。随着道教金丹术的演变，《周易参同契》也流行起来，这一切，都推动了象数派的复兴。

几百年中，王弼《周易注》被官方定为《周易》的标准读本。经过王弼等人的批判，汉代象数派及其观物取象说已是百孔千疮。重新复兴的象数派虽然同样关心卦象的意义特别是八卦的起源，但是不能重复过时的观物取象说。他们必须另辟蹊径。他们找到了数。

刘牧的《易数钩隐图》说，过去的《周易》注家，“分经析义”都很妙，但在解释天地错综之数方面，往往非常简略。刘牧说：“形由象生，象由数设。舍其数，则无以见四象所由之宗”（《易数钩隐图序》）。这是说，卦象是由数而产生的。

宋代象数派，不论他们对刘牧的学问持什么态度，都以不同的方式支持了“象由数设”的意见。

唐□□评论宋代的学问说：“濂溪、明道、伊川，讲道盛矣；因数明理，复由一邵康节出焉；晦庵、南轩、东莱，讲道盛矣；因数明理，复有一蔡西山出焉。孔孟数人，言理不言数，邵、蔡二子欲发诸子之所未发，而使理与数灿然于天地之间，其功亦不绌矣”（《宋儒学案·西山蔡氏学案》）。

依唐某的说法，邵雍、蔡元定“因数明理”，创造了和周、张、程、朱同样伟大的事业。蔡元定之子蔡沈继承其父的事业，

完成了《洪范皇极》，其序言中说：“《易》更四圣而象已著，《范》锡神禹而数不传。后之作者，昧象数之原，窒变通之妙……”，他甚至批评司马光等人，对数的理解和运用也是牵强附会。他认为：“天地之所以肇者，数也；人物之所以生者，数也；万事之所以失得者，亦数也。……”（《洪范皇极·序》）。从邵雍到蔡沈，都没有简单地把数作为象的源泉，而是认为“数出于理”，但对数的歌颂也算无以复加了。

蔡沈所讲的数是《洪范》数。但在多数易学家看来，最重要的乃是“大衍之数”。

汉代京房、马融、郑玄等人，或用太极两仪、四象八卦、五音六律，或用四时五行、二十八宿、天干地支等解释大衍之数的根据。这仍是观物取象说的翻版。刘牧说，象这样“采摭天地名数强配其义”，就会“靡所不可”（《易数钩隐图·论上》）。

必须为大衍之数找到更为合理、更为神圣的根据。于是刘牧创造了河图、洛书。

蔡元定说：“洛书者，数之原也”（《蔡沈《洪范皇极·序》》）。其实河图和洛书一样，在宋人看来，都是数的源泉。

二、河图、洛书的问世

和其他民族一样，创造神物、圣物，也是中国古代宗教活动的重要内容。

中国古代，皇帝不仅握有最高的政治权力，而且是宗教活动的最高首领：他是祭天的主祭，而且只有他才能祭天。为皇帝寻找一个神圣的出身，具有非常重要的政治意义。汉朝皇帝把自己说成是赤帝之子，唐朝皇帝说自己是老子的后裔，宋朝皇帝借翊圣将军事件为自己找到了一个神圣的先祖。

宋真宗即位，王钦若劝宋真宗伪造天书，在宗教上制造自己和上帝的特殊关系，以达到无法用军事力量来实现的政治效果。

宋真宗犹豫不决。王钦若说：“天瑞安可必得！前代盖有人力为之者。陛下谓河图、洛书果有此乎？圣人以神道设教耳。”（《续资治通鉴》卷27）。宋真宗仍然犹豫，又问大臣杜镐：河图、洛书怎么回事？杜镐说：不过是神道设教罢了（《续资治通鉴长编》卷67）。宋真宗于是坚定了伪造天书的决心。但是宋真宗没有伪造河图、洛书，历史把这个任务留给了学者。

刘牧把数作为理解《周易》的基础。他的《易数钩隐图》说太极是一，两仪是天一地二天三地四，四象则是六七八九。他还用数解释了“一阴一阳之道”，“形上”、“形下”之说。说“形而上者谓之道”就是“地六而上谓之道”，“形而下者谓之器”就是“地六而下谓之器”。至于卦，乃是“天垂自然之象”。圣人先看到了河图、洛书，又观“天地奇偶之数”，于是画成了八卦。

因为“形而上者谓之道”，未著乎形器，所以只有象，而河图就是“示其象也”。因为10属土数，“土数入乎形器”，所以河图数只有45（图一）。洛书“所以成变化而著形器”，所以洛书数55（图二）。在河图、洛书之外，刘牧还用了50余幅图象说明《周易》那抽象的道理。

刘牧大约感到自己的创造活动会受到指摘，在《易数钩隐图》最后，他设问道：“今书世之传者龙图龟书，经所不载。纬候之书，蔑闻其义，诚诞说也”。他回答道：“龙图龟书虽不载于经，亦前贤迭相传授也。然而数与象合，位将卦偶，不盈不缩，符于自然，非人智所能设之也。况乎古今阴阳之书靡不宗之。至于通神明之德，与天地之理应如影响，岂曰妄乎！”刘牧用“前贤相传”，“符于自然”，“应天地之理”为自己辩护，这就明白道出，河图、洛书乃是后人的创造，甚至就是他自己的创造。

刘牧死后，他的弟子们把《易数钩隐图》及他的其他的著作献给皇帝，受到表彰。

当时的阮逸反对刘牧。阮逸伪托北朝关朗造作了一个《关朗易传》，其中说河图55点，洛书45点。与刘牧的说法刚好相反。

然而，阮逸和刘牧相反的，仅是把哪个叫河图，哪个叫洛书？在思想上，他也和刘牧一样，认为创造这样一个图是必要的。

刘牧的图得到了朱震的支持，阮逸的图却得到了蔡元定和朱熹的支持。元明时代，朱熹的易学成为官方颁布的定论，以55点为河图（图三），45点为洛书（图四）的意见也就成了定说，直到如今。

河图、洛书出现以后，不少人都以自己认为正确的方式把它们与八卦卦象联系出来，以表示河图、洛书是八卦之源。下面是这类努力之一种（图五、六）。

三、汉代河图观及其影响

关于河图的记载最早见于《尚书·顾命》篇：“越玉五重：陈宝、赤刀、大训、弘璧、琬、琰，左西序；大玉、夷玉、天球、河图，在东序。”说的是周成王死，康王继位，在登基大典上，陈列者一些玉器。河图，是玉器之一。但这是什么玉器？历代众说纷纭，莫衷一是。

其后是《论语·子罕》篇孔子的叹息：“凤鸟不至，河不出图，吾已矣夫”。这里指出了河图乃是黄河里出来的图。

再后是《周易·系辞传》的“河出图、洛出书，圣人则之”。这里加上了“洛出书”和“圣人则之”。“则之”于什么？则没有解释。因为上文已经说了“天垂象，见吉凶，圣人象之”，明确说了圣人据天象以画卦象，与仰观俯察说相一致。

此外，《墨子·非攻》篇有“河出籀图”说。后来的《吕氏春秋·观表》篇、《淮南子·俶真训》也都讲到“绿图”，或“河出绿图”事。“绿”即“籀”，注家多以为是文字写成的预

言。而图，则是图形、地图之类。这就是说，绿图，乃是带有文字的图。

汉代人热烈地讨论了河图、洛书问题。他们的讨论，大致可归为三点：1.河图、洛书是龙、龟或龙马（一种高头大马）从黄河、洛河里背负或口啣出来的；2.河图是图或带有文字的图，洛书是文字写的书；3.圣人“则”河图以画八卦，或径直认为河图就是八卦。

除了历代人们常引用的孔安国、刘歆、班固、郑玄等人的说法外，我们还可以补充一些材料：

《汉书·沟洫志》载，谷永上言：“河，中国之经渎。圣王兴，则出图书……河图，象也。故则之以画卦。洛书，文字也。故则之以系辞”。

《汉书·王莽传》载，泾河岸崩塌，致使河水北流。群臣庆贺，“以为河图所谓‘以土填水’，匈奴灭亡之祥也”。大约汉代人确实创造过一种河图，那是一种带有预言文字的图。

《王莽传》中说还有一种“紫阁图”，也是带有文字的图。

图是图形，“象”；书是文字。乃是汉代人的一般认识。除去他们编造的神话，对图、书的认识倒比较合乎常理。

统治一个国家，除了设官分职、制订国策、讲究治术、教化百姓以外，最重要的事情之一，就是要了解国情：版图大小，道路远近，山川路途，民俗物产。《山海经》、《禹贡》，就是讲述这些内容的文字。据这些文字，即可画成地图。假若神任命某人作君主，非常必要的事情之一，就是给它一张这个国家的国情图。正因为如此，汉代人才编造了许许多多黄帝、尧、舜、禹、汤、文王等人受河图的神话。地图对于治国的重要，直到现代也是如此。在古代，得到了某处的地图，就意味着得到了某处的统治权，所以荆轲见秦王，献上地图，就等于献上了城池。刘邦入咸阳，诸将都去抢金银财宝，只有萧何“先入收秦丞相御史律令

图书藏之”，使刘邦“具知天下阨塞，户口多少、强弱处，民所疼苦者”（《汉书·萧何传》）。东汉马融说：“古人有言：左手据天下之图，右手刎其喉，愚夫不为”（《后汉书·马融传》）。“据天下图”就意味着统治天下，在马融以前已是流行的观念。

刘牧列举了汉代儒者的意见，说“诸儒以……书载天神言语，陈列字数，实非通论”（《易数钩隐图》）。当然，说河图有字有图更非通论。他坚定相信，那黑白点组成的河图洛书，“非后人能假伪而设之”。它们出于羲皇之世，而且“非羲皇不能画之卦，合其象”（《易数钩隐图》）。

宋代许多儒者，从各自不同的立场出发，还保持着一点清醒的头脑。王钦若、杜镐说河图、洛书是“神道设教”，就是说他们很清楚地知道，所说这些神物，其实是不存在的子虚乌有之事。欧阳修则明确指出：“河、洛不出图、书”（《易童子问》）。程颐见人卖兔子，就说：“圣人见河图、洛书而画八卦，然何必图书，只看此兔亦可作八卦”（《周易传义附录·程子易纲领》），对河图、洛书表示了极大的不敬。被称为程门别派的薛季宣不否认河图、洛书的存在，但他相信《春秋·命历序》的说法：“河图帝王之阶，图载江河山川州界之分野”。他认为，据此而言，“则河图、洛书乃《山海经》之类。在夏为《禹贡》，周为职方氏所掌。今诸路《闰年图经》、汉司空《輿地图》、《地理志》之比也”（《宋元学案·艮斋学案》）。

尽管有人反对，但是朱熹说：“无奈《顾命》、《系辞》、《论语》皆有是言”。而且河图与天地之数合，是“易之所自出”；“洛书与九畴之数合，是“《洪范》之所自出”。且安知河图不是伏羲远求近取之一事？（《见李光地《易学启蒙注》引）。

尽管朱熹辩护，但图是形象，书是文字的常识观念仍然困扰

着人们，于是吴澄说：“河图者，羲皇画卦之前，河有龙马出，而马背之旋毛有此数也”，“以背毛之旋文如图星者之圆圈，故名之曰图”；“洛书者，大禹治水之时，洛有神龟出，而龟甲之圻文有此数也”（吴澄《易纂言外翼》卷7）。

吴澄所说的图象如下：（图七、图八）

对吴澄的修补，我们只能形容以“捉襟见肘”，“欲盖弥彰”。但吴澄的图，还是被后世许多易学著作所引用。

四、阴阳鱼图的出现及其意义

长期以来，人们也企图在黑白点之外，把太极、两仪、四象、八卦，统一于一个图形之中。把卦象画在表示太极的圆圈周围，是统一的方式之一。如朱熹《周易本义》卷首图：（图九）

也有的把八卦画在表示太极的圆圈之内（图略）。

林至用黑白相间的图象表示太极、两仪、四象、八卦的分化过程：（图十、十一、十二、十三）。

假如我们用一条曲线将黑白两个区域分开，就近似一个阴阳鱼图了。

据朱熹说，杨时有次到詹季鲁家，“季鲁问易”，杨时拿过一张纸，画一个圈，涂黑一半，说“这便是易”。朱熹认为“此说极好”。他认为，“易只是一阴一阳，做出许多般样”（《朱子语类》卷65）。

然而，宋代以前，一阴一阳的道理讲了一千多年，对一阴一阳的理解却与后来并不一样。在道教方面，从唐代吴筠到唐宋之际兴起的内丹学，都认为修炼就是变化气质，炼尽纯阴，成纯阳之体，于是得道成仙。“纯阳子”一类的道号，就是这种思想的反映。儒家方面，直到刘牧，还认为天是独阳，地是独阴。阴阳混杂的，只是天地之中的人与物。

依理而推，阴阳学说产生不久，“阴中有阳”，“阳中有阴”

的思想就产生了。比如战国时代就讲阳气潜藏于地下，就是阴中有阳。但这种阴中有阳的意思只是说阳进入了阴中，而阴阳双方，就其自身来讲，仍然你是你、我是我，泾渭分明。

周敦颐讲太极“动而生阳”，“静而生阴”，张载讲“一物两体”，表明人们对阴阳的认识已经进了一步。但朱熹当时看到的周氏太极图，上数第二圈仍然是“黑中有白，而白中无黑”（《朱文公文集》卷42《答胡广仲》），即仍然保留着阴是阴，阳是阳的传统观念。这样的图，至今仍保存在宋代杨甲的《六经图》、元代张理的《周易图》和《大易象数钩深图》中。据《四库提要》考证，《六经图》成于绍兴年间。此时正当朱震猷图以后不久。杨甲的图，可能较为接近朱震猷图的原貌。朱熹看到的，就是这样的图（图十四）。

按照朱熹的思想，阴阳只是一气。阳之退，便是阴之生。不是阳退了，又别有个“阴生”（《朱子语类》卷65）。“大抵阴阳只是一气。阴气流行即为阳，阳气凝聚即为阴，非直有二物相对也”（《朱文公文集》卷50《答杨元范书》）。所以他认为那“黑中有白，而白中无黑”的图象是不对的，不合周敦颐原意。经过他改动的图，不仅黑中有白，而且白中有黑。现在一般所见的，就是朱熹改过的图。朱熹似乎认为，这样的图，才较为贴切地表达《周易》一阴一阳的意义。

把太极阴阳八卦统于一图的愿望，对一阴一阳的深入理解，以及卦气图所表现的阴阳消长思想，都促进了新的易图的诞生。

宋朝末年，谢枋得有三张易图，后来袁桷曾作《易三图序》，说是谢得自彭翁，彭翁得自武夷君。而这图起初乃是蔡元定入蜀所得，蔡元定入蜀，又是因为薛季宣说“河洛遗学多在蜀汉间”。至于图的形状，袁桷没有说明。

明初，宋濂作《河图洛书说》，其中提到“江东谢枋得又传河图于异人，颇祖于八卦，而坎离中画相交流，似于方士抽坎填

离之术”。从宋濂的描述看，谢枋得的图很象阴阳鱼图，并且名叫“河图”。但是宋濂没有绘出图象。宋濂同时还提到：“新安罗端良尝出图书示人，谓建安蔡季通传于青城山隐者。图则阴阳相合，就其中八分之，则为八卦。书则画井文于方圈之内，绝与前数者不类”。罗愿的图象如何？宋濂也未绘出。

宋濂的记述表明，宋明之际，又有两种河图问世，它们或表示“阴阳相合”，或者“坎离中画相交流”。至于宋濂本人，则认为“刘歆以八卦为河图，班固以洪范初一至次九六十五字为洛书本文，庶几近之”（《河图洛书说》）。

稍后于宋濂，赵撝谦的《六书本义》第一次公布了阴阳鱼图（图十五）。并说这就是龙马背负出于荥河，伏羲据此而画八卦的图，就是康王即位时在东序的河图，是蔡元定入蜀得到的图，有“太极函阴阳，阴阳函八卦自然之妙”。所以他命名为“天地自然河图”。并说这是“万世文字之本原，造化之枢纽”。

“天地自然河图”一出，就受到了许多人的热烈欢迎，只是有人不信它是朱熹派蔡季通入蜀所得。由于朱熹《周易本义》已被官方奉为定说，而黑白点河图、洛书也成定论，阴阳鱼图就不能叫作河图。因为有周敦颐的太极图在，这图也不能叫作太极图。明朝末年，章潢作《图书编》，赵仲全作《道学正宗》，把阴阳鱼图叫作“古太极图”。然而刘宗周仍然把阴阳鱼图叫作河图（见《刘之遗书》卷2）。清初，胡渭作《易图明辨》，说这图也叫先天图。陈抟传给种放，后来又传给邵雍的，就是这个图。邵雍的先天学，就是从这个图里演化出来的。随着这图的广泛流布，人们逐渐把它定名为太极图，周敦颐的太极图反而很少有人知道了。本世纪前期，杭辛斋《易学藏书》道：

以上三图，皆称太极。周子之图，仅见于性理诸书，习之者今已不多。来氏之图，传亦不广。惟第二图风行宇内，几与八卦并传。

所说“第二图”，就是阴阳鱼太极图。杭辛斋说，“阴阳鱼”乃是“阴阳仪”的讹称。

五、阴阳鱼图的意义

杨时画个圆，涂黑一半，说这就是易。朱熹说，易只是一阴一阳，做出许多般样。依他们的意见，只要显示出一阴一阳的关系，就是显示了《周易》最根本的道理。刘牧当时创造河图，用奇偶表示阴阳。他的河图、洛书不仅要显示数的根源，而且要表示道器关系，表示一阴一阳之道。

阴阳鱼图的出现，首先是表示太极、阴阳的关系，阴阳和八卦的关系，这就是赵抃谦的“太极含阴阳，阴阳含八卦之妙”。

宋明时代还有许多太极图，太极被画成一个空心圆。因为无论是把太极当成元气还是把太极作为理，太极都是一个未分化的统一体，所以只能画成一个空心圆。当要表示阴阳、四象、八卦的时候，就依次再画，以表示太极衍生的过程。但这样的图把太极当成可脱离阴阳而存在的东西，把阴阳当成可以脱离八卦而存在的东西。阴阳鱼图把太极阴阳八卦统一于一个图中，从图形上就显示出阴阳就在太极之中，八卦就在阴阳之中。所以有人认为它比周氏太极图更加合理，它是“先天之易”，周氏太极图是“后天之易”，“先天所以包后天之理，后天所以发明先天之妙”

（《易经来注图解》，巴蜀书社，1988年，第554页）。明朝人的见解，为阴阳鱼图取代周氏太极图埋下了伏笔。

杨时所画，只是黑白各半。朱熹将周氏太极图上数第二圆改成黑白相间。宋濂说罗愿的图“阴阳相合”，谢枋得的圆“坎离中画相交流”。如果把阴阳鱼图的乾、坤二位用直径联起，圆则被分为左右两半。左半是阳，但其中有阴；右半是阴，但其中有阳。涂黑的部分有白点，未涂的部分有黑点。这就表示阴中有阳，阳中有阴，明末赵仲全的《道学正宗》说：“古太极图，阳生于北，

而盛于南；阴生于南，而盛于北。阳中有阴，阴中有阳，而两仪，而四象，而八卦，皆自然而然者也”。

阴阳鱼图不仅表示阴中有阳、阳中有阴，阴阳不是泾渭分明，而且那流畅的曲线还给人一种动感，因而它又表示着阴阳二气不停息地运动，而那黑白回互，并且由窄细逐渐拓宽的形状，又表示着阴阳二气运动中的互相交流，此消彼长。清初胡渭作《易图明辨》，盛赞阴阳鱼图的巧妙。他说这个图，“其环中为太极，两边白黑回互。白为阳，黑为阴。”它表示着“阴盛于北，而阳起薄之……以至于乾，而阳斯盛焉”；“阳盛于南，而阴来迎之……以至于坤，而阴斯盛焉”，完成一轮循环。至于八卦方位及卦划的奇偶阴阳，“与白黑之质，次第相应”。他赞扬道：“天工乎！人巧乎！其自然而然之妙，非窃窥造化阴阳之秘者，亦不能为也”（《易图明辨》卷3）。胡渭只是反对把它说成是伏羲之河图。

阴阳消长的思想至晚在战国时代的思想界已广有影响。当时的阴阳家邹衍被各国君主待若上宾。战国末年成书的《吕氏春秋》，其“十二纪”的基本框架，就立足于阴阳消长的思想之上。该书用许多文字描述了一年十二月中，由于阴阳二气此消彼长所决定的天道人事状况。《礼记》中的月令，不过是“十二纪”的缩写本。

阴阳消长的思想本不属于《周易》，《易传》中讲一阴一阳，阴阳相推，倒应是较受了阴阳家及其他学派对阴阳二气运动、消长的认识。汉代讲“天人感应”，也叫作“推阴阳”。阴阳消长的思想对易学的影响进一步加深。于是产生了卦气说。由于卦象原本不是为描述阴阳消长而作，用于描述阴阳二气的消长不免捉襟见肘，于是扬雄才另创了一套太玄符号。宋代邵雍的先天图及皇极经世说，是汉代卦气说的改进和推广；司马光、蔡沈等人的《潜虚》、《洪范皇极》等等乃是扬雄独创精神的发扬。汉

代人是否把卦气说，太玄作成图？已难以考证。宋代人却把卦气说，潜虚等等都作成了图，表示阴阳二气的消长。这样的图多是一个很大的空心圆，周围排布着密密麻麻的卦象等符号或有关文字。依据说明，我们可以看懂该图的意义，但是无法形象地看出阴阳二气的消长情况。

阴阳鱼图把阴阳二气此消彼长的道理变成黑白回互的视觉形象，图象简明，线条流畅，使人一目了然。因而它也逐渐取得了卦气图的地位。

明末章潢作《图书编》，把阴阳鱼图称为《古太极图》放在全书之首，并说明道：“总图即太极也；黑白即阴阳两仪、天地卑高、贵贱动静、刚柔之定位也；黑白多寡，即阴阳之消长。太阴太阳、少阴少阳、群分类聚、成象成形、寒往暑来、乾男坤女，悉于此乎见也”（《古太极图说》）。认真研究此图，则“太极生生之妙，完具胸中”；“天地之化机，圣神之治教，不事他求”。而且，“执中，执此也；慎独，慎此也；千古之心传，传此也”（《古太极图叙》）。依章潢的解释，则阴阳鱼图蕴含着天道、人事中的一切。

编者按：文中标列图七、图八、图十、图十一、图十二、图十三、图十四、图十五，详见下期封二、封三。

〔待 续〕

图1 刘牧河图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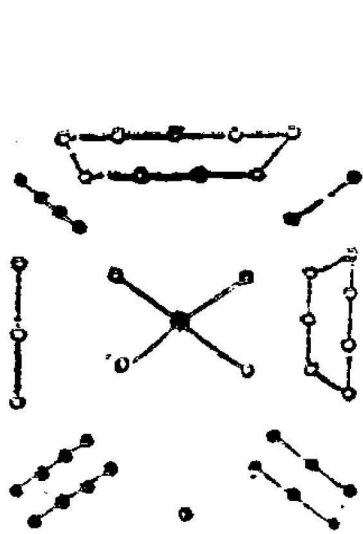


图2 刘牧洛书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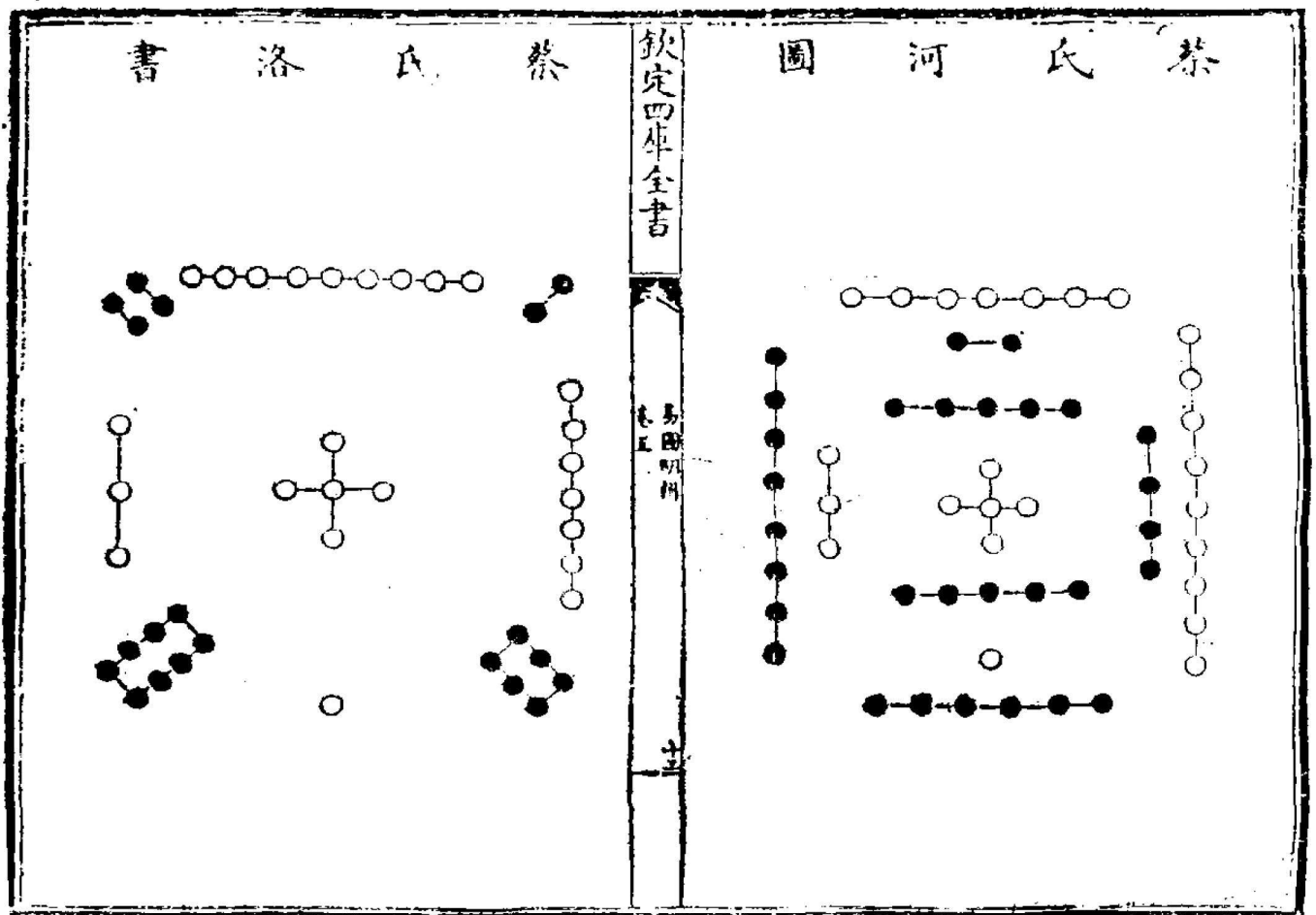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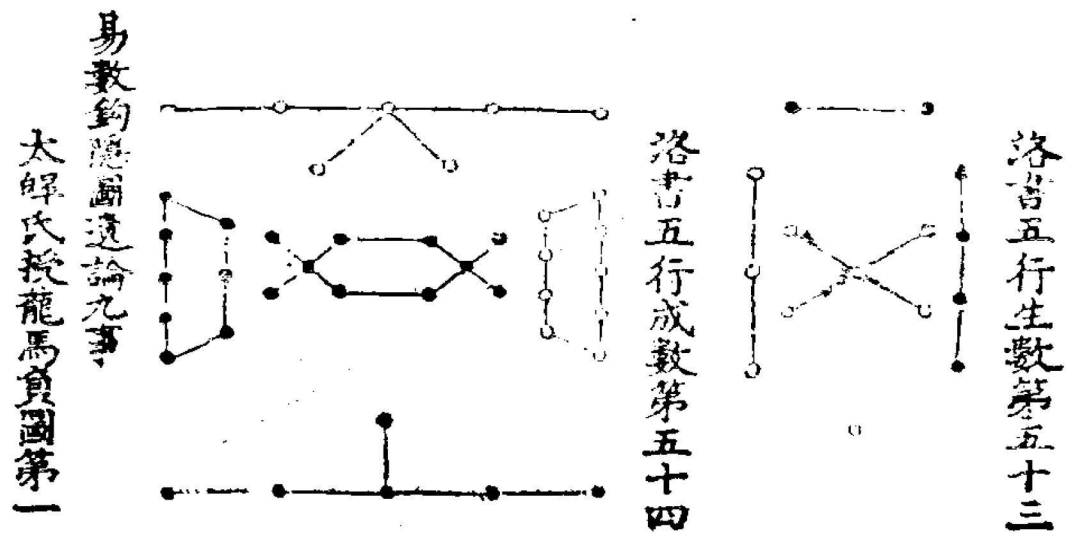


图3、4 通行的河图洛书

封2、封3: 周易图象学思潮插图 (见第65页)

图5.6 河图、洛书配八卦图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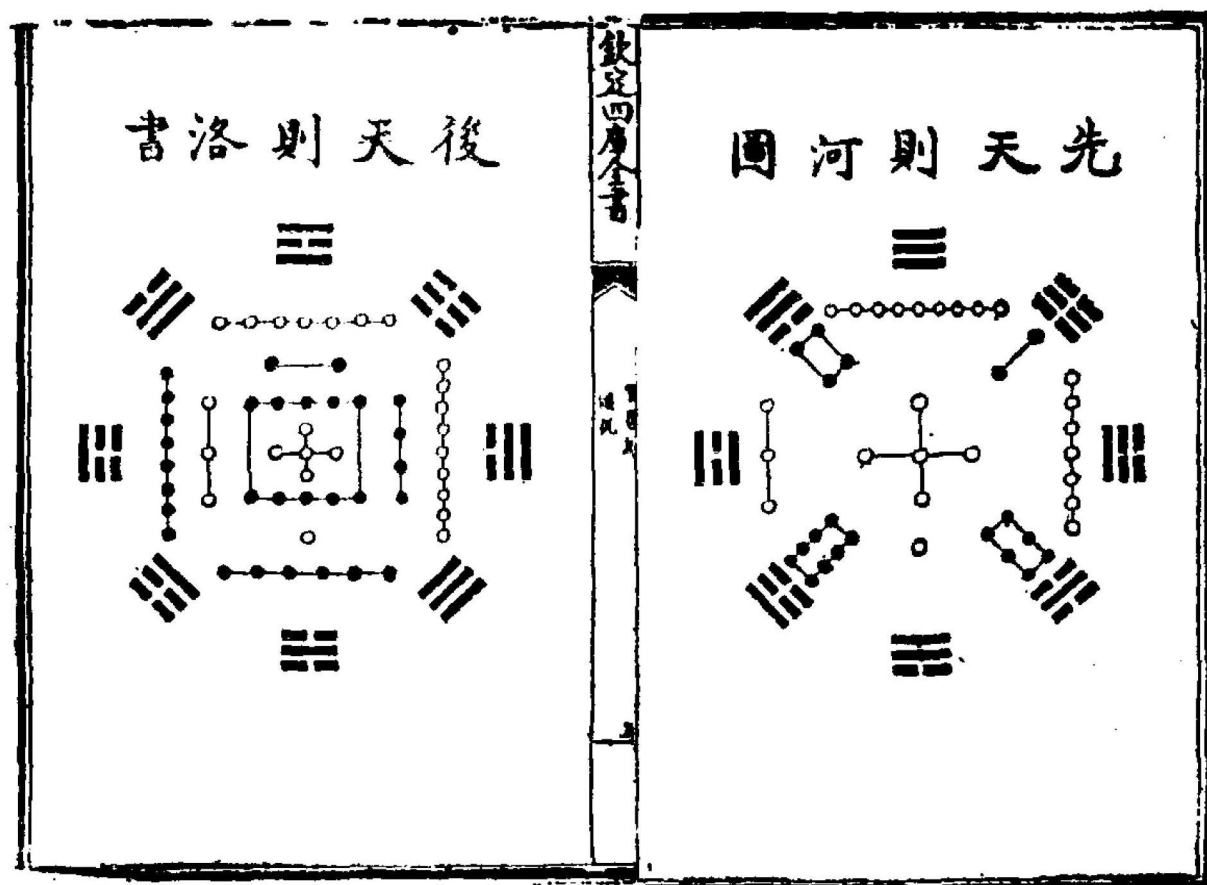


图9 《周易本义》太极八卦图